

赫胥黎乌托邦书写中的优生学思想研究

王璇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受西方传统优生学思想影响, 阿道司·赫胥黎在以未来乌托邦为主题的创作中将生育控制作为社会构建的重要手段, 同时, 他也对数量与质量辩证关系的失衡有着一定警醒。本文将聚焦赫胥黎在不同时期创作的《美丽新世界》《猿与本质》《岛》这三部小说, 以乌托邦文学研究、社会学和生物学视角, 结合优生学、优绩主义批判、后人类女性主义等理论, 对其优生学思想的演变进行探究, 梳理作者对未来社会设想和忧虑的阶段性变化, 以及反思在“后人类”的语境下可能会出现生存困境。

关键词: 阿道司·赫胥黎; 乌托邦书写; 优生学; 优绩主义; 后人类

A Study of Eugenics Thought in Huxley's Utopia Writing

Wang Xua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Shandong Qingdao 266100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eugenics ideology in the West, Adolphus Huxley regarded birth control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his creation with the theme of future utopia.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had a certain warning about the imbalance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Huxley's three novels, "Brave New World," "Apes and Essence," and "The Island," created at different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topian literature research, sociology, and biology, combined with theories such as eugenics, eugenics criticism, and post human feminism, it will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his eugenics ideas, sort out the author's stage changes in future social ideas and concerns, and reflect on the possible survival difficulties that may arise in the context of "post humanity."

Keywords: Adolphus huxley; Utopian writing; Eugenics; Merit based approach; Posthuman

0 引言

受 20 世纪欧美国家优生学浪潮以及达尔文进化论影响, 出身英国高知家庭的阿道司·赫胥黎对“人种优化”(race betterment) 理念有着密切关注, 且观其在 20 世纪初的活动轨迹, 他与英国优生学会(the Eugenics Society)也有着一定联系。和诸多职业生物学家、优生学家不同的是, 赫胥黎倾向用文学解读社会, 探索未来出路。优生学在英美文学创作中历来有迹可循, 如萧伯纳的《人与超人》(1903)、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1905)、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的国》(1915)、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 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1985) 等。除主要的三部乌托邦题材作品, 在赫胥黎的很多其他作品中, 也有对生育控制的探讨, 如早期小说《黄色的克洛姆宅》(1921)、《滑稽的环舞》(1923)、《那些贫瘠的叶子》(1925)、《旋律与对位》(1928) 等。

本文旨在从乌托邦文学、优生学、优绩主义批判、后人类女性主义等学术视角出发, 分析赫胥黎的乌托邦题材

小说, 主要包括其两部经典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1932)、《猿与本质》(1948) 和离世前最后一部乌托邦小说《岛》(1962), 梳理作者的优生学思想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中的动态演变。

1 《美丽新世界》与优生学

与赫胥黎家族交往甚密的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和阿道司的祖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 一样都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 同时其在 19 世纪晚期创作的著作《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ences) 为 20 世纪初优生学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将“适者生存”的生物学概念引申至社会学的家庭结构中, 面对人口过剩的问题, 提倡“unfit”(智力有缺陷或有遗传性精神疾病的人) 不应组建家庭、繁衍后代, 而鼓励像赫胥黎家族这样的“智力精英”尽可能多地生育。从优生学概念的源头来看, 资本主义催生的优绩主义赋予了早期优生学家们一种“精英的傲慢”, 他们大多来自英国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 被希望限制生

育的“低智力”阶层(如工人阶级当中的体力劳动者)在这样的潮流中没有太多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另外,阿道司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对优生学浪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朱利安是20世纪英国优生学界重要的领军人物,1959-1962期间担任优生学会主席,主要通过出版科普作品和参与政治活动推行优生学理念。阿道司虽然并没有直接加入过优生学会,但通过他与哥哥还有学会另一重要成员卡洛斯·帕顿·布莱克(Calos Paton Blacker)的书信往来,不难发现阿道司对优生学的相关理念、发展及推行有着密切关注,有证据显示他的第一部成名作《美丽新世界》其实是对优生学的推崇者霍尔丹(J.B.S. Haldane)所著短文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作出的消极回应^[1],阿道司对优生学的批判可见一斑。

具体来说,《美丽新世界》揭示了赫胥黎对优生学思想及推行未来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的质疑。尽管文中从第一章开始就大量着墨伦敦生育与培育中心批量生产人类的生育控制场景,从小说反乌托邦的主题来说,它的讽刺效果是大于对优生学的宣传效果的。该书出版后还引起了当时优生学家的不满,认为它是对优生学的直接攻击。小说详述了未来社会“世界国”中人类的生产过程,即“瓶中婴儿”,包括体外授精(IVF)和“博卡诺夫斯基过程”(Bokanovsky's Process, 让一个受精卵分裂成多个胚胎),从生产源头对胚胎进行差异化培养和条件反射训练,并对国民加以洗脑式的催眠教育,从而形成了五种由高到低的社会阶层,以阶级固化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样高强度的极权主义的控制下,个体失去了认知的主体性,传统的伦理道德、人性和自由消失殆尽。在1946年赫胥黎为小说所作的新序言中,他坦言小说的主题并不是科技的进步,而是科技的进步对人类个体的影响^[2],即在优生学家、现代科技的狂热者们(techno-enthusiasts)忙于推行自己的理念时,他已经开始考虑该理念的可行性及后果了。后来在1958年的论文集《重返美丽新世界》第二章“Quantity, Quality, Morality”中赫胥黎又说道:在《美丽新世界》里,我所幻想的优生学和劣生学得以系统实现^[3]。可见赫胥黎是以文学创作为途径,进行思想的实践,以预言式的设定抒发自己的担忧——“这场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革命将不是在外部的世界,而是在人类的灵与肉中实现”^[4]。

值得注意的是,赫胥黎的乌托邦书写中有一定的女性主义关照,在三部小说中皆有与主题深刻相关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以《美丽新世界》中的琳达为例,一位“贝塔”阶层的量产人类,在乌托邦世界仍处于“第二性”的社会

地位,在经历了胎生后走向疯魔,儿子约翰在最后也陷入了癫狂选择自杀。首先以后人类的视角来说,在当代话语中,“后人类”描述了人类与机器融合后产生的存在或存在状态。这个术语可能指代某种特定的存在,无论是基因工程或技术增强的人类形式、人机混合体,还是人工智能或虚拟存在。它也可能指代伴随着人文主义意识形态解构而出现的新形式的主体性、关系性或政治性^[4]。进一步结合2022年布拉伊多蒂在论著《后人类女性主义》中提出的融合性概念来看,如琳达一般的女性生存状况在“后人类”的语境下将有新的定义和考量。赫胥黎后来也在反思他们的出路:“如果现在我要重写这本书,我会赋予野人(胎生人类)第三条道路。在乌托邦和原始社会这个两难境地之间,将会有保持健全神智的可能性”^[5]。

2《猿与本质》与优生学

《猿与本质》写于二战尾声时期,面对大规模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赫胥黎对社会改良的希望跌落谷底,其对优生学的探索也陷入一种绝望境地,可以说这是赫胥黎悲观情绪最为集中的一部小说。小说通过框架故事(frame story)的叙事手法,层层递进向读者揭露了假想的核战争结束后一个极端堕落、混乱的世界,旧日文明社会所提倡的道德与尊严不复存在,人退化成猿以后显示出极尽卑鄙丑恶的一面。故事中来自新西兰的探险队在北美大陆发现了一个由虚假宗教统治的残酷族群,在这里,优生学走向了极端——人们通过屠杀身体畸形的婴儿、虐待他们的母亲来实现“人种净化”,在定期举行的“贝利亚之日”祭奠上,母亲们被集中起来当众遭受酷刑和侮辱。故事中,女性被公认为“恶魔的容器”(vessel of the Unholy Spirit)、“畸形的源头”(source of all deformity)、“肮脏的产卵者”(spawner of filth)等,仅仅作为生育和劳动工具苟延残喘。早在1937年的论文集《目的与手段》中,赫胥黎就探讨过理想与实现理想的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6],联系到优生学来说,也许它的出发点是好的,最初的优生学家们希望通过生育控制、基因改良等手段达成建设美好社会的目的,然而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优生学在欧洲大陆被错误地转化成了宣扬种族主义的有力工具,赫胥黎批判的正是这种通过大规模暴力来实现理想的极端做法,认为这些手段造成的后果与理想往往背道而驰。在1946年发表的论文“Science, Liberty and Peace”中,赫胥黎继续反思科技发展沦为少数统治者的压迫工具的可能性,呼吁人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要关注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6]。

以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卢拉为例,她深处地狱漩涡,目睹存活下来的人屠杀、盗墓、焚毁书籍、恶魔崇拜等种种恶行,特别是好友波莉在生下畸形男婴后遭到的迫害,她最终选择和男主普尔逃离族群,去寻找充满希望和自由的彼方“Fresno”。作为部落中少数拥有正常人类情感的成员之一,她因为“外来人”普尔的出现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代表着废墟世界最后一丝道德和精神文明。小说原文结尾并未说明这对爱侣最终是否出逃成功,毕竟前文大主教曾警示过背叛者的下场,因此他们的出走既可以看做是对新乌托邦的探索,也可以解读为一种无望的挣扎。

3《岛》与优生学

赫胥黎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岛》,与前两部反面乌托邦主题不同,《岛》塑造了一个融洽自治的乌托邦社会——帕拉岛,这里达成了真正的社会进步和个人完善,生育控制和生殖技术得到了人性化的、可持续的利用。排除了《美丽新世界》中技术至上对人类思考主体性的剥夺,以及《猿与本质》中“种族净化”对人性慈悲的泯灭,《岛》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赫胥黎晚年对未来社会最后一次理想探索——“我们陷入了伦理上的两难境地,必须倾注所有的智慧和善意,才能找到一条中庸之道”^[1]。

从帕拉岛的设计理念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从优生学所提倡的基因决定论中偏移,把后天环境因素(如基础教育等)纳入考虑范围内。具体来说,帕拉岛的工作制度不以效率优先,首先考虑的是人和他们的满足感。正如作者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探讨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帕拉岛明显选择了后者。他们的“中庸之道”即结合粮食产量、衣服和住房来控制生育,并教育他们成为人格健全的公民。其中大多数夫妇接受并深度利用人工授精技术,让后代携带更优秀的基因库里的遗传物质,这样也就意味着更好的命运——“我们十分清楚只有一部分命运是可以掌控的”。同时年幼的孩子要接受血液、心理、体型等测试,对其中心智品德有异的孩子提供合理的治疗,从个体身心层面采取措施辅助解决未来可能会出现权力竞争和压迫问题。加之“互助领养俱乐部”的形成,如此种种,这座岛屿“设计得如此完美,使每个居住在这座迷人小岛上的居民,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都最大限度地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快乐”。但这个完美的乌托邦因为石油资源遭到了外部资本主义国家的侵袭,在小说的最后,作者暗示了它的崩塌——“百年辛劳的结果一夜间毁去。然而真理却不会改变——终必有苦,苦必有终”、“声音显得异常兴奋,又把先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什么进步、价值、石油、纯正

精神。车队像来时一样时隐时现,声音也时有时无。飘忽的声音用最大的调门称颂着新成立的联合王国第一任首相是如何伟大”^[7]。

在1959年所做的《人类的处境》系列演讲中赫胥黎说道:“必须强调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基因的变异性,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改善环境。只有当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营养和教育机会时,我们才能充分看到他的天赋能力。因为只有这样,这些能力才不会因营养不良或缺乏教育设施而被掩盖,才有可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与许多早期的优生学家所说的相反,仅仅对‘不适者’进行绝育或试图从‘适者’中选育出特别的人是不够的;绝对有必要建立一个强调良好环境重要性的社会,以便我们能够看到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的全部遗传可能性^[8]。”在他的创作后期,赫胥黎逐步接受了人类潜力的可能性和人生的多样性,这促使他更加关注普遍的公平公正而不仅仅是鼓吹“智力精英”。

4 结语

回顾三部小说的创作历程及主题演变,可以看出从初时质疑到中期绝望,再到晚年重拾希望,赫胥黎一直没有放弃将优生学特别是生育控制、生殖技术作为社会改良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与优绩主义有合谋的一面,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优生学也做出了反思和批判,规避了向极端种族主义的转化,显示了其创作思想人道主义的另一面。在当今生殖技术普遍介入人类生活、人们对生育话题关注度不断提升的社会语境下,需要我们给予一定赫胥黎式的人文关怀。

希望通过本文能够让更多学者了解和关注赫胥黎作为作家、思想家甚至哲学家的多面性,他以独特的人文关怀,在创作中反思社会现状并预言问题出路,彰显了文学应有之功效。他对优生学的复杂态度也折射出他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考虑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心路历程,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应有之视野。并且当今社会对生育控制、生殖技术的探索并未停歇,资本主义所奉行的优绩主义带来的异化问题也常遭诟病,在“后人类”语境下如何面对种种新的困境和挑战,是我们在现代化道路上需要去对照反思和剖析的。

参考文献:

- [1] Woiak, J. 2007. Designing a brave new world: eugenics, politics and fiction. *The Public Historian* 29(3): 105-129.
- [2] Huxley, Aldous (阿道司·赫胥黎) 著, 陈超译. 2017, 《美丽新世界》.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著:

1932.Brave New World.London: Chatto & Windus.

[3] Huxley, Aldous (阿道司·赫胥黎) 著, 陈超译, 2017,《重返美丽新世界》.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著: 1958. 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4] Marks, P., J. A. Wagner-Lawlor & F. Vieira (eds.). 2022.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Utopian and Dystopian Literatures.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5] Huxley, A. 2017. Ends and Mea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Ideals.New York: Routledge.

[6] Huxley,A.1950.Science, Liberty and Peace. London: Chatto & Windus.

[7] Huxley,Aldous (阿道司·赫胥黎) 著, 鄢佳译. 2018,《岛》. 北京: 天地出版社. 原著: 1962.Island. London: Chatto & Windus.

[8] Huxley, A.1977. The Human Situation: Lectures at Santa Barbara,1959.New York: Harper & Row.